

09

長寧文史資料



159

854



上海市长宁区政协
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印

一九八五年

- 为《长宁文史资料》出版说几句话 编委会 (1)
- 长宁区简介 长宁区地名办公室 (3)
- 省吾中学——解放战争时期的“民主堡垒” 季勤先 (69)
- 反帝斗争烈火中诞生的光华大学 王子扬 (6)
- 曹家渡与圣约翰大学 郑朝强 (13)
- 从长宁中学想到蒋希国先生 杜重石 (18)
- 飞跃的发展, 惨痛的创伤
- 申新一厂的经营始末 (外诗词三首) 朱龙湛 (23)
- 六十年来热水瓶在我国的沿革
- 兼述永生热水瓶厂的创建和发展 吴榕性 (37)
- 旧上海第一小镇——法华镇 潘德孚 (46)
- 周家桥今昔 龚宝藻 (50)
- 昔日鸦奔尔突, 今天燕舞莺歌
- 区工人俱乐部基地上的变迁 苏文 (56)
- 从一幢楼房易其主看时代变迁
- 记区少年宫旧址 史树人 (60)
- 烈士公园——上海中山公园前身 阎维德 (64)

为《长宁文史资料》出版说几句话

解放后不久，人民政协就开展文史资料工作。一九五九年，周恩来总理首先提出倡议。号召全国各级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积极撰写亲身经历或亲闻亲见的史料，用以弥补历史文献之不足，得到广泛响应，取得了巨大成绩。十年动乱期间，此项工作不幸中断，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恢复。现在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同志亲自抓这工作，曾几次发表重要讲话，提出更广泛地征集文史资料的号召。征集的题材从过去以军事、政治为主题向文教、科技、工商经济等方面发展。征集对象也随之扩大，不但在国内向更多方面的人士征稿，还欢迎大陆以外的同胞供稿。征集的意义已不是单纯地为历史文献提供素材，而且在教育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在继承和发展祖国文化遗产，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加强同社会各界人士的联系，在帮助爱国统一战线的发展和巩固，以及促进祖国统一等方面，都起了积极作用。目前文史资料工作在政协工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进行爱国主义宣传教育方面，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长宁区政协在文革前就已响应周总理的倡导，积极开展征集文史资料的工作，发动各界民主人士撰稿，并将收到的稿件转交上级政协，成绩很大。文革后，随着区政协活动的恢复，此项工作于一九八一年四季度也已开始。在党领导的重视和政协领导的指引下，三年多以来，区内各界人士对于这工作的重要性提高了认识，知道供稿是为社会主

义祖国作贡献的实际行动，是自己的历史责任，是爱国主义的表现，都积极供稿。尤其使人感动的是不少撰稿的同志年事已高，体弱有病，仍竭尽所知作出贡献。在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下，我们的工作取得较好的成绩。截至一九八五年一季度止，我们共收到173篇稿件，字数约计七十五万。来稿所记述的基本上都是撰稿人的亲身经历和见闻，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因而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我们根据内容所涉及的范围，分别转送全国政协、上海市政协或其他有关组织，或留存本区政协，作为重要参考材料。我们送交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8篇，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编委会83篇，其他方面62篇，普遍受到欢迎。我们的征集工作也获得他们的好评。经全国政协和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室的遴选，先后已有若干篇刊登在全国的《文史资料选辑》和《上海文史资料选辑》上。现在我们也整理出侧重于本区的文史资料12篇，辑成本刊印行。我们的目的在于更好地保存撰稿人所提供的宝贵史料，并把这些史料公之于众，使其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同时还希望通过本刊的印行，推动征集工作的进一步发展，会使更多的海内外同志踊跃撰稿。

这是我们的初次尝试，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加上我们经验不足，舛错必定很多，还望读者不吝赐教，帮助我们改正。我们恳切请求你们给予大力的支持和鼓励，并在此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辑承供稿人撰写文章，及有关方面惠供资料，值兹出版之时，谨致谢忱。

长宁文史资料编委会

一九八五年七月

长宁区简介

长宁区位于上海市市区西南部，因长宁路横贯于境内而得名。

建国前，长宁区原名上海特别市第九区、法曹区、长宁区。建国后沿用长宁区原名至今。当时区界北起吴淞江，东以江苏路、华山路，南以淮海西路，西以沪杭铁路为界，面积仅4.8平方公里。以后，经过六次区划调整：一九五〇年划进铁路以西周家桥地区；一九五六年静安区、新泾区建制撤销，静安区将常德路、富民路以西地区划归长宁区，新泾区将天山新村地区新生乡，新虹乡划归长宁区；一九五九年静安区建制恢复，将镇宁路以东地区划归静安区；一九八二年上海县新泾公社、虹桥公社部分地区（仙霞新村地区）划入长宁区；一九八三年将宋庆龄陵园及邻近地区划入长宁区；一九八四年将上海县北新泾镇及虹桥、新泾二乡部分地区划入长宁区。因此现有区划东以镇宁路、兴国路与静安区、徐汇区为邻；南以淮海中路、淮海西路、徐虹铁路支线与徐汇区、上海县接壤；西以虹桥机场、西郊公园、新泾港以东；周家浜、新开河以北，北翟路四号桥以东，与上海县相连；北沿吴淞江与普陀区隔江相望。面积为28.14平方公里，人口约45万。区人民政府设在愚园路1352号。辖有天山、仙霞、遵义、周家桥、华山路、江苏路、新华路、武夷八个街道办事处及北新泾镇人民政府。

长宁区是个夹杂着一些中、小型工厂的住宅区。较早以前，除法华镇、曹家渡、周家桥是集镇外，均为农田及稀疏村落。十九世纪末，英、法租界当局为了扩大势力范围，越界筑路，修筑了白利南路（长宁路）、愚园路、海格路（华山路）、安和寺路（新华路）、虹桥路等二十多条道路，并在道路两侧修建花园住宅，成为住宅区的雏形。因地处吴淞江南岸，沪杭铁路由北而南经过，并设有梵皇渡站（今西站），水陆交通方便，加上与市中心地区相比地价低廉，故有富商巨贾在此购地创办工厂，工厂所招用的穷苦工人只能在工厂之旁或洋房之后搭简陋棚屋栖身，因此形成今日工厂和民房交错，公馆和棚户为邻的状况。

沪杭铁路穿越长宁区中部，将区分成为路东和路西两部分。路东为“老区”，中山公园附近的愚园路是区委、区人民政府所在地，区少年宫、区工人俱乐部、区人民银行、长宁电影院、新华书店也设于此，商业网点较为集中，是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新华路两侧兴建多层住宅群，开设香花商场和百货衣着、鞋帽、食品、医药等中等规模店群，法华浜已于一九五八年填平埋管，连同法华街建成法华镇路，原浜址今已蔚然成一绿化带。旧有街镇古老住房尚较完整，嘉荫堂、广誉堂、豫鄂堂等历史遗迹约略可寻。路西主要是建国后新建的新村住宅区。五十年代起陆续建造了天山新村、联建新村、伊犁新村等；七十年代建造虹桥新村；八十年代建造山霞新村等。天山新村商业服务单位多达百余个，各种行业基本齐全，还有天山电影院、区

图书馆、区中心医院等，是路西的中心。延安西路伊犁路附近为全市瞩目的虹桥开发区，将建造多幢级别较高的旅游饭店、贸易谈判中心和外国驻沪领事馆（部分已开工）。附近有上海花圃占地136亩，划分为盆景、盆花、花卉花灌木三大区。虹桥机场、西郊宾馆、龙柏饭店、上海动物园等均座落于西郊虹桥路一带。

区内有吴淞江（苏州河）一段，长4·6公里。沿江有小码头和渡口，较大的工厂有硬化油厂、天原化工厂、上棉二十一厂、上棉五厂、第一纺织机械厂等。中山路桥、铁路二号桥、曹杨路桥横跨江上。全区现有道路80余条，较大的道路有：中山西路是市区的环路，车流密集，交通繁忙；延安西路是市区主要干道；新华路是虹桥机场通向市区的要道，沿路绿荫蔽日，环境幽静；江苏路是市区的南北向干道，北通普陀区、嘉定县，南通徐汇区、闵行区，路幅较狭，车辆拥挤，正着手拓宽路面改善交通。

在本区的大专院校有：华东纺织工学院、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华东政法学院、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等。科研单位有：生物制品研究所、冶金研究所、硅酸盐研究所等。游览及体育场所有：中山公园、天山公园、沪西体育场、跳伞塔、长宁网球场、长宁游泳池等。

陵园路上有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陵园，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供国外来宾及国内人民瞻仰。愚园路1376弄34号（亨昌里）是《布尔什维克》编辑部旧址（1927~1932），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长宁区地名办公室供稿

反帝斗争烈火中诞生的光华大学

王子扬

(朱有献, 沈昭文, 赵家璧口述, 范子琛记录, 王子扬整理)

《光华大学是具有光荣斗争历史的高等学府。它是在一九二五年诞生的, 当时定六月三日为校庆节。今年正值诞生六十周年, 校友们曾在六月三日这一天假华东师范大学举行隆重的校庆活动, 出席有校友六百余人济济一堂, 叙旧尽欢。校友姚依林特来电视贺, 校友张耀忠等到会并讲话。笔者兹整理这篇史料, 聊作献礼。》

光华大学是一所私立大学, 它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反帝斗争的产物, 又是“五·卅”运动的产物, 取名光华, 有“光我中华”的伟大含义。它于一九二五年九月正式开学, 经历了二十六個年頭, 为我国培养一万多名大学生, 对我国教育事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 上海日华纱厂工人因反对帝国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 与日方厂主发生冲突, 日人开枪打死工人顾正红, 同时受枪伤或刀伤者七人。广大工人对此非常气愤, 而受帝国主义指挥的公共租界巡捕房, 不但不惩办凶手, 反而逮捕工人。于是上海大专学生深感不平 and 愤怒, 纷纷走上街头宣讲顾正红被杀的真相。五月三十日, 在上海南京路上, 工部局巡捕房派出的许多红头阿三(即印度巡捕)竟对爱国的游行人群开枪, 当场死伤很多, 殷红的鲜血洒遍了南京路。这就是耸人听闻、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在上海中山公园后面，苏州河畔，有一所环境清幽的学府，那就是圣约翰大学。它是美帝国主义利用教会对我国进行文化侵略的一个大本营。它用耶稣十二门徒之一的使徒约翰的名字作校名，十足地反映着浓厚的宗教色彩。它在美国哥伦比亚专区登记注册，始终不向我国政府办理立案手续，充分暴露了藐视中国人民的狰狞面目。它用宗教麻醉中国人民，因而圣约翰大学的同学们，一向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ABC”著称。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下午，交通部工业专科学校学生聂光晖（原圣约翰大学学生）前往圣约翰大学讲演，宣传爱国学生支持工人反帝斗争的英勇事迹。演讲还没有结束，该校美籍校长卜舛济竟亲临现场，蛮横无理地将演讲者赶出校门。六月一日上午，教授钱基博上国文课时，气愤地说：“我们虽同在外国人办的学校里教书和学习，但我们是中国人，不能眼看外国人杀害我国同胞而无所表示”。圣约翰大学学生对教会学校的奴化教育早就不满，又亲眼看见“五·卅”惨案的发生，感到耻辱和愤怒，他们的血沸腾了，行动起来了。立即改组学生自治会，成立大、中学生会，与上海各校学生采取一致行动。实行罢课，并要求爱国教授大力支持。当天中午，中文部主任孟宪承召开教授座谈会，有钱基博、何仲英、伍朝樞、顾颉刚（附中教员）等十四位教师参加。孟宪承发言说：“假如学生们只知道自己是圣约翰的学生，而忘记了是中国人，亲眼看到同胞为外国人屠杀，而漠然无动于衷，这对我们平日所讲的国民自觉教育，将无法自圆其说。”

后我们也无颜面再以学问文章与学生相见于讲台。今天学生们自觉地行动起来了，我们能不支持吗？”他的话激发了教授们的爱国热情，一致表示支持学生的罢课行动。师生们怒吼了，圣约翰校园沸腾起来了。就在这天晚上，卜舫济也召开了全校教授会议。在会上，一美籍教授竭力反对学生罢课，竟胡说什么：“圣约翰学校在工部局保护和管辖之下，竟容忍学生在校进行反英宣传，是大不应该的，这些学生简直是叛徒……”等语。钱基博教授听了他的话，怒不可遏，未待他说完，立即站起来驳斥他说：“吾国人无拳无勇以就戮于英人，枪弹横飞，血流街衢。若使此事发生在美国或任何国家，其国人必裂眦切齿，思得以报，恐不仅仅奔走哀号，如我国人今日所为己也。何以责怪我国人之呼号冤痛者为罪焉？”闻者无不动容。孟教授边哭边译钱教授发言。可是冷酷无情、顽固专横的卜舫济还是坚持己见，并说：“学生若要罢课，就得立即离开圣约翰”。当时剑拔弩张，斗争非常激烈，双方相持不下。结果用无记名投票方式，以三十一票对十九票，通过了罢课，以及学生可以留在学校的决议。但卜舫济还是蛮横地说：“校长有自由处理校事之权，绝不教授会之决议所束缚”。六月二日上午，卜舫济召开教授、学生代表联席会议，宣布放假七天，学生可以留校。同时学生会则决定在一、二两日实行罢课，并组织小分队，分往校外宣传。有的学生提出要求，在六月三日悬挂半旗，对死难者表示哀悼。当时卜舫济被迫表示同意。到六月三日早晨，由童子军首领潘志杰主持升旗。当学生排队去升旗处（两根旗杆竖在校长

室前面)致哀时,卜勋济竟食前言,不仅不允许持半旗,还把旗子抢走,并命令学生当天离校。学生对此非常气愤,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立即齐集礼堂开会,会议由张祖堃、许体钢主持(许是上海淞沪交涉使许秋帆儿子,许秋帆以后为光华校董之一)。这时丙寅级(1926级)学生谢祖发激愤万分,起立发言说:“我们是堂堂的中国人,不是驯服的奴隶,不是软骨头,决不会在帝国主义者威力面前低头。我马上离开这所学校,让他们看看中国人是不可侮的!”他那慷慨激昂的讲话,引起全体到会学生的共鸣,个个义愤填膺,群情振奋,纷纷表示支持他的爱国行动,当场签名的就有数百人。就在当天下午三点多钟,他们排着队,共有553人,有秩序地离开了圣约翰大学,并登报发表声明。教师们也召开会议,教授孟宪承、钱基博等和行政人员十七人(一说19人),还有工人十人,为支持学生的爱国正义行动,也分别发表离校宣言。有一些研究生和应届毕业生登报声明,在任何情况下,决不接受圣约翰大学的文凭和学位。

圣约翰大学高校师生员工的爱国行动,立刻受到各阶层群众的同情和支持。南洋大学(现即交大)和复旦中学学生会热情接待了离校同学,使一些在上海无家可归的学生有了食宿之处。他们发出誓言:为了收复教育主权,为了维护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光荣,决心为成立中国人自己办的大学而努力。

六月四日离校学生在复旦中学开会,决议废除圣约翰学生会名义,改组成立:“圣约翰大学暨附中学生善后委员会”,选定委员 42

人主持会务，并推许体纲、张祖培担任正副主席。办公处设在复旦中学（现在华山路淮海路口）。该会主要任务：一是安排学生转学和负责向社会募捐；二是筹备成立中国人自己办的学校。他们这一正义行动，得到了学生家长和社会人士的热情支持和关怀。于是有的赠现金，有的捐地产，有的献图书、仪器等等，情绪热烈（笔者也曾捐赠测量仪器十架）。在帝国主义者面前，中国人民是团结一致的。不久学校放暑假了，有八个人留在复旦办公，他们是史乃康、徐可嫫、施复昌、潘子端、陈训恕（陈布雷弟）、张华联、张悦联（同为张寿镛子）、沈昭文。后来沈昭文又参加上海学生总会，任宣传工作，参与编辑一种英文刊物。

当时由张悦联、张华联两兄弟首先提出倡议，筹办大学，乃父张寿镛极力支持。张寿镛曾任财政部次长是一位银行家（又是一位学者，曾研究王阳明之学，编辑汇刻四明丛书）他既愿捐资兴学，又有号召力，经他登高一呼，事情就好办了。另有同学王华照、王福照兄弟的父亲王省三，对建校也很热心。他在上海法华镇有许多地产，便慷慨捐助了九十多亩土地，作为校址。因此建校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为了不忘在圣约翰时因下半旗为死难烈士志哀而遭受的耻辱，特在新校舍前面也树立两根大旗杆，以作永久纪念。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四日，筹备新校临时委员会成立，并登报通告。二十三日决定校名为“光华大学”，寓有光我中华之意，又决定“六·三”为校庆，“知行合一”为校训。二十七日成立私立光华大学筹备

会，推举张寿镛为校长，先在霞飞路（现淮海中路）租赁几幢房屋为临时校舍，当年九月正式开学。翌年法华镇大西路（即现华东纺织工学院地址）新校舍建成，即行迁入。后来，“八·一三”日帝侵华，这校舍全部毁于日军炮火之下，兵燹之后，仅存一座牌楼，现仍留有照片，可作见证。

张寿镛校长的办学方针，对于延请教授，主张兼收并蓄，不拘一格。当时所罗致的人才极一时之盛。他聘请张歆海为副校长，朱经农为教务长，廖世承为附中校长。他极力效法北大蔡元培，吸收各方面的人才，如聘请张东荪、李石岑、胡适等教哲学，朱公谨、沈昭文、颜任生教数理化学，胡朴安、钱基博、吕思勉、徐志摩、梁实秋教文史，王造时、潘光旦、罗隆基教政治经济，蒋维乔教佛学，田汉教戏剧，魏文伯、江问渔、黄炎培等都曾担任教课。这说明他的办学精神，是想把光华办成与北大、南开一样的名流云集的最高学府。

廖世承在办南京东大附中时，很有成绩，张寿镛就慕名请他主办附中，对他非常尊重，一切用人、行政、经济收支等方面都不加干预。还常对人言及要茂如（廖的号）放手办学，展其所长。当时有过这样的话：大学要向银行贷款，而中学却在银行里存款。廖任职时，住在宿舍内，和教师学生一起吃饭，每天早操都亲自到场，处处以身作则。故附中校风很好，在当时享有很高声誉。学生中有许多进步反帝的爱国分子，他们有的是慕名从各地教会学校及东大附中转来的，也有一些因廖的关系而来的，朱有猷就是其中之一。光华附中的教师质量都

比较高，解放后有不少人被调到大学任教，如孙良工、吴俊升等，有的后来成为武汉大学的骨干。

张寿镛当时是财政金融界的红人，对外面来客不随便接见，只有学校去的人门房不加阻拦，可以进入他的内室。事无大小，他总是亲切听取并表示意见。由此可见他是非常重视知识分子的。光华大学教授的特遇，一般也比较高，还可到别校兼课，例如罗隆基就同时在中国公学兼课。

张寿镛本是浙江四明寒士，富有爱国思想。日寇进入上海后，要光华大学向他们登记。张说：如果他们定要这样办，我宁愿解散光华，决不登记。所以后来光华曾一度改为正诚补习学社、格致学社等。由此可见他的高贵品质和反帝爱国的思想。

大夏大学内迁贵阳时，光华大学也随之内迁。副校长谢霖甫系四川人，与四川地方有渊源，因而提议迁往成都成立分校。在成都，学校造了不少房子，抗战胜利后，都送给华面大学。

抗战期间，上海光华大学校舍被日寇付诸一炬，成为一片焦土。胜利后赔得四川路欧阳路的三幢日本人房子，作为校舍，由朱经农任大学校长，廖世承任副校长。当时校董有秉志（主席）、赵锡恩、许沅、吕思勉、孙瑞璜、荣毅仁、王子扬、沈昭文、廖世承、朱言钧、王守恒、王华熙、张华联等。

在一九五一年院系调整时，光华工科并入同济大学，文科、理科并入华东师大，在延安西路的原校址，改建为华东纺织工学院。

曹家渡与圣约翰大学

郑朝强

曹家渡为沪西一个老镇，而且是一个较大的镇，今天除东首五角场分属长宁、静安、普陀三区管辖外，其余全部属于长宁区。它位于旧时代的租界外面，但离公共租界的西北角很近。占据上海租界的帝国主义者很早就蓄谋把沪西一大片土地并入租界，曹家渡镇当然也受其觊觎。因此在沪西很广阔的区域内，他们抢筑了不少马路，称为越界筑路，并在路旁建屋，及征收巡捕捐。有好几条这样的马路通过或通向曹家渡镇。极司非而路（今称万航渡路）是其中的一条。它从处在租界边缘的静安寺遗址和穿过该镇，并一直延伸到远在西面的周家桥镇。劳勃生路（今称长寿路）则从租界北面通到该镇，并在那里与白利南路（今称长宁路）衔接，后者则一直向西延伸至周家桥镇以西。另有康脑脱路（今称康定路）夹在极司非而路与劳勃生路中间，通至快到该镇处与极司非而路相接。此外，在穿过该镇的一段极司非而路北西，靠近苏州河岸边，还有一条极司非而路后路（今称万航渡路后路），在镇的东首与前路和劳勃生路及白利南路相接，在镇的中部复与前路接通。因此在镇的东首有五条路段相接，形成一个五角场，即有名的曹家渡五角场。极司非而后路沿苏州河岸边处有一座人行木桥（今已改建成可以通行车辆的宽阔钢筋混凝土桥，并与江苏路衔接）。

称为三官堂桥，过桥即为闸北。沿极司非而路东段和康脑脱路两旁都建有住宅，多为花园洋房和较新式的里弄房子。沿旁勃生路则没有很多纺织厂、铁工厂及其他工厂。三官堂桥北端为农产品集散地，由苏州河运来的蔬菜及其他农产品多半在那里卸货，并在那里批发出去。租界内开始出现无轨电车时，即有16路无轨电车在五角场设起点站（不久前才因改线移至东新路），从那里起向东沿工厂林立的旁勃生路通向市中心。沿康脑脱路则有10路公共汽车，从与极司非而路相接处起点通向市中心。因此曹家渡镇的水陆交通相当便利。但在镇内的极司非而路上，没有公共车辆行驶，除黄包车外，四十年代以前尚有羊角车供人代步。随着镇内和附近居民的增加，工厂的设置，和交通的发达，商业也逐渐繁荣起来。环绕五角场和沿着镇的东段，商店林立，生意兴旺。这里有好多家沽衣店，出售当满未赎的旧衣，沿街叫卖，招徕生意。不少在旁勃生路一带工厂做工的男女工人，以及运菜来镇销售的农民，就在那里购买便宜的服装。在五角场的北角，好几十年以前就设有奥飞姆电影院（现改名为沪西电影院），附近还有其他娱乐场所，更增加该处的热闹。这些都使曹家渡镇的规模日益扩大，由原始的冷静村镇变成繁华的市镇。在五角场中心原有一块三六亩的空地，1927年初，正当大革命的北伐军日益逼近上海的时候，反动军阀孙传芳部下李宝章的大刀队到处抓捕革命党人，加以残酷杀害。大约在二月间，大夏大学有两位学生陈俊与顾中被害，他们在那块空地上杀头，并悬首示众。目前这块空地已经盖满了房屋。沿路一侧都开了

店铺，并设立邮电局和银行，成为这地带最热闹的地方。

曹家渡镇东西长约一公里，其西首尽头处原设有美国教会开办的圣约翰大学和圣玛利亚女中，在镇的南面后来又设有圣约翰青年会中学（初中并附设小学）。圣约翰大学创建于一八七九年，开始时称圣约翰书院，只设高中课程，到一九一一年才成为大学，并增设高中。此校一直到一九三六年都只收男生。圣玛利亚女中与圣约翰大学差不多同时创建，纯为女子中学。两校都设在苏州河的一个大弯处，被外人称为极司非而（Jessfield）的地方，圣约翰位在南面，圣玛利亚位在北面，两校仅一墙之隔。极司非而地方的名称，极司非而路的抢筑，极司非而公园（Jessfield Park，原中文名称为兆丰公园，今改名中山公园，与圣约翰大学仅一路之隔，其北大门与圣约翰校门相对）的建立，以及圣约翰大学的选址，都充分说明帝国主义者早已包藏吞并沪西，包括曹家渡镇在内的狼子野心。当初圣约翰校园并非依傍极司非而路，在它的南西尚有九亩称为温家宅（英文名称 Unkaza）的土地把它与该路隔开，并使它与圣玛利亚两校进出都要通过一条小巷。到一九一一年圣约翰才把这块土地购为已有。圣玛利亚在一九二四年迁移到铁路以西的白利南路新址，把其原有校舍划归圣约翰。到此时，圣约翰才拥有苏州河这个大弯内的全部土地。圣约翰青年会中学及附小创建于一九一五年，创办人为圣约翰大学校友翟同庆先生。它不是教会办的学校，与圣约翰没有附属关系，但毕业生升入圣约翰的颇不少。这三所学校的存在使曹家渡镇增添了几分光彩。也